



Institutional Desir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n 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

制度适宜与 经济增长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李若谷 何自云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Institutional Desir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n China's Road to
Development

制度适宜与 经济增长

——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李若谷 何白云 ◎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仲 垣 张黎黎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赵燕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适宜与经济增长——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 李若谷, 何白云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049 - 9758 - 6

I. ①制… II. ①李… ②何…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制度—研究
②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8372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239 毫米

印张 19

字数 231 千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9758 - 6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63263947





作者简介

李若谷 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行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驻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和东南非开发银行等机构的中国副理事。1981年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



作者简介

何自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1992年毕业于中国金融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5年、200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分别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5年至今，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主要从事商业银行管理、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哲学和货币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仲 垣 张黎黎

封面设计：金 培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前言

(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上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饱受质疑。

对中国发展方式的不理解，从根本上源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不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将其称为“北京共识”，也有人称其为“中国模式”。无论何种称谓，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为几个世纪以来苦苦探索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广大后发国家提供了选择。

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现在需要在理论上取得应有的成就，关键是要让世界了解并理解中国制度上的成就，这与西方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一样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希望中西文化互学互鉴，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前夕，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为实施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目前，中国再次面临如何发展的问题。应该承认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与充分融入世界市场、利用已有的国际制度是分不

开的。因此，总结好经验与教训，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会有启示。

(二)

制度适宜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也是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坚持把经济发展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只要是能使经济不断发展和生产力不断提升的做法就支持。同时，必须处理好稳定、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没有稳定的环境，经济发展无法实现，没有不断的改革，发展也无法实现，而发展又是稳定和改革的基础。要发展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敢于创新，敢于冲破原有制度的束缚。改革也好，创新也好，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能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发展的经验就是要有适宜的制度，适宜的制度就是能够促进发展的制度。因此，制度的选择应该与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所处的国际环境相适应，同时要随着条件和环境的改变，特别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在变与不变之中达成适宜制度。因此，制度适宜实际上是变与不变的哲学，环境是变的，制度是变的，而制度必须适应发展的需要这一原则是不变的。

制度适宜理论与西方制度经济学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并不存在最优制度，也不存在普适性制度。无论是市场经济模式还是计划经济模式，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都不可能所有发展阶段适用于所有国家；任何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和具体环境，探索建立适合于自己的独特制度。

东西方在经济发展基本理论方面是有差异的。西方的观念中总是有一个所谓的“最佳模式”，世界各国都应当效仿，例如“华盛顿

共识”。但世界是具有多样性的，这个所谓的最佳模式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所有发展阶段。这种思维方式不变，就不会有前途。“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实行多年，并没能帮助这些国家复制美国的成功，相反遗留下来的是增长缓慢甚至近乎停滞的经济，以及所谓的“民主政治”，使这些国家贻误了集中发展的时机。而中国发展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模式的模式”，也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发展阶段建立最适合自己的适宜制度，不断地去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情况和要求。

中国改革的渐进特征是对制度适宜这一原则的最好诠释。中国在推出一项改革措施时，总是先在较小范围内进行试点，根据试点的情况进行修正、完善，然后逐步推广到更多的地区。这样做的好处是，改革措施更贴近各地的实际情况，通过试点检验后也容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有利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因而较容易取得成功。

制度适宜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充分体现。“中和”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就是反对极端和对立，崇尚和谐，遵循自然法则。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的就是人、地、天、道应一脉相承、顺应自然的运行法则。因此，中国人在社会活动中更注重自我节制，强调根据客观情况和现实环境，逐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盲目追求理论中存在而现实中无法达到的所谓最优，不追求并不存在的“最佳制度”，而是侧重更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寻找适合特定环境的适宜制度。因而，坚定对以适宜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发展道路的信心，也必将有助于坚定对中国文化的信心。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在制度适宜这一总原则下成功解决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关键问题：一是建立起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为中国高增长提供了强劲的经济动力；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主导，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这两个方面互为支撑、互为强化，缺一不可。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立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为促进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用不到 30 年的时间就建立了比较好的工业基础，但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其弊端开始显现，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激励不足。改革开放最为明显的成就是建立起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换激发了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得大量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得以出台，并得到有效实施；通过分权让利还原了个人、企业的经济主体地位，解决了竞争和激励问题，在各类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下，更多的经济资源被投入到了生产活动当中；通过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解决了集中决策的信息成本问题，各种经济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市场和分工扩大了市场范围，发挥了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提高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激发了全社会的改革热情、劳动热情、投资热情和教育热情，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

仅仅建立起有效激励机制还远远不足以实现实际的经济增长，实施“休克疗法”的转轨经济国家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它们通过私有化，建立起了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但并没有实现经济的持续

高速增长。中国高增长的实现，除了经济动力和资金来源以外，还得益于一个使这一强大动力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那就是稳定的环境，而这一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主导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了改革的普惠目标，这一点为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想拥护，再加上改革推进的渐进性，保证了改革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稳定。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体系通过贷款创造的货币，如果管理得不好，就有可能产生威胁经济金融稳定的两个不利后果，一是不良贷款，二是通货膨胀。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确实曾一度形成了巨额的不良贷款，但银行和企业的国有属性确保了经济金融的稳定，同时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得这些不良贷款得到了较好的处置，使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作用降到了尽可能低的程度，而使其创造货币进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却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增长率始终大大超过实际经济增长率，但却始终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并未出现持续的或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银行体系的严格管理使中国居民对银行体系有着几乎从未动摇的信心，中国相当部分的货币被持有者视为一种资产持有者，并未形成促进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再加上中国价格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物价得以始终保持基本稳定。

当然，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都不应被神化。市场与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动态中寻找平衡。如果盲目相信市场的作用，走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危机就会出现。如果过分使用政府的力量去调整经济，就会扭曲市场，阻碍经济的发展。这已经被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所印证。

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国的

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持续了四十年，与四十年前相比，当前的改革在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和重点领域等方面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从制度适宜角度来看，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作出制度上的改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四大提出的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为“决定性作用”）是实现制度适宜性的关键。绝不能因为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曾经取得成功就认为这个模式可以一成不变地坚持下去。随着市场主体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以及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在不断下降，现在已经到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了。同时，也要时刻警惕市场失灵的发生。要在继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断调整以实现制度的适宜性，其中蕴含的正是变与不变的哲学思想。

（四）

本书是由我和何白云合作，在我十年前出版的《制度适宜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一书（以下简称原书）的基础上增补、删节、修改而成。本书保留了原书对制度适宜理论的阐述和对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许多论述今天仍然成立，故未作修改。本书增加了对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具体讨论以及近年来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新思考，更新了部分数据，修正了一些文字表述。为节省篇幅，本书删除了原书中很具启示性的大量图表、数据和分析，因此，原书仍有阅读和参考价值。

原书把中国发展经验概括为“中国模式”。虽然我在原书中已经反复强调，“中国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说并非某种特定的模式，而是一种方法、理念和哲学思想，它强调变是永恒的”，近年来我也不断指出，“中国模式是没有模式的模式”，但“模式”一词常常容易引起

误解，可能会被认为应该能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直接复制使用。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在本书中将其改称为“中国发展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讨论的经济问题是正式的银行体系建立之后的问题，而不是人类发展其他阶段的问题。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中国金融出版社的魏革军社长，以及仲垣、张黎黎编辑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向他们表示真诚感谢。

李若石

2018年7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经济高增长实践的理论挑战 /1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出现高增长 /1

第二节 对中国经济何以快速增长的理论解释尚不充分 /11

第三节 制度适宜是解释中国之谜的钥匙 /28

第二章 制度适宜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边界 /32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适宜 /32

第二节 制度适宜的标准 /39

第三节 制度适宜的相对性和动态性 /51

第四节 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和驼峰路径 /56

第五节 适宜制度的产生 /70

第三章 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选择 /77

第一节 发展中经济体对发展道路的探索 /77

第二节 西方模式 /84

第三节 东亚模式 /90

第四节 苏联模式 /105

第五节 拉丁美洲模式 /112

第六节 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128

第四章 中国计划经济的制度适宜性 /135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经济的困境和变革 /135
- 第二节 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必然性 /139
- 第三节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 /144
- 第四节 计划经济体制的适宜性 /150
- 第五节 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问题 /155

第五章 制度适宜、激励机制与中国高增长的经济动力 /162

- 第一节 改革的宏观经济动力和基本路径 /162
- 第二节 逐步市场化与微观经济动力的激发 /170
- 第三节 制度适宜激发劳动热情 /178
- 第四节 制度适宜激发投资热情 /187
- 第五节 制度适宜激发教育热情 /192

第六章 制度适宜、政府主导与中国高增长的稳定环境 /196

-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政府主导性 /196
- 第二节 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和社会稳定 /203
- 第三节 不良贷款的“贡献”与经济金融稳定 /216

第七章 制度适宜视角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228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 /228
- 第二节 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性 /240
- 第三节 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255
- 第四节 以制度创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263
- 第五节 需要新的思想解放 /271

参考文献 /277

第一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践的理论挑战

中国经济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平均保持着近 10% 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实属罕见，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投入到试图揭开其谜底的研究中，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本章对现有的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自己的研究视角。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硕果累累，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对外贸易额日益扩大，吸引外资不断增加；国际经济合作成就斐然，对外援助日渐拓展，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

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可说是一穷二白。1952 年，中国的 GDP 仅为 679 亿元。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1978 年 GDP 达到 3 645 亿元，排世界第 10 位，扣除价格因素，1952—1978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6.1%。^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了长达四十年增长过程，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表1.1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达到41.30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而在同一年，中国在货物出口总额和外汇储备两个方面都位居世界第一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中国成为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标志着中国在“引进来”的同时，也开始大规模“走出去”了。

表 1.1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居世界的位次

指 标	1978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5年	2016年
国内生产总值	11	12	11	6	2	2	2
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	29	26	16	8	2	1	2
出口额	31	30	15	7	1	1	1
进口额	29	22	18	8	2	2	2
外商直接投资	128	55	13	9	2	4	3
对外直接投资	45	63	23	35	5	5	2
外汇储备	38	36	9	2	1	1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7。

1978—201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从改革开放前的6.1%大幅提高到9.6%，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2016年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2.4%，而1990年时还只有2.8%（见图1.1）。

^① 除非另外注明，本书正文所引数据中，1978年前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9；1978—2016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辑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际统计年鉴》。